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人物追踪】	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	华新民
【春秋史笔】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下）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秦 晖
【千秋功罪】	关于文革的定性	段协平
【往事非烟】	我的1966年夏秋	郁 琪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人物追踪】

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

· 华新民 ·

蒯大富无疑是文革期间在校大学生——俗称“老五届”——中最知名的人物，从某些方面说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近年在接受访谈时发表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回顾和反思，他本人也在香港出版了《清华文革五十天》，并通过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出版了“准回忆录”《清华蒯大富》。本文通过整理和展示他在这些场合发表的某些文字言论，试图探索他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脉络，在此与文革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共享。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自始至终主导着文革的进程，又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崇拜偶像。对毛泽东的看法无疑是今天这些“老五届”人世界观、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对于那些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的学生领袖如蒯大富这样的人，他们这些年里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何变化，这是人们必然会感到好奇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蒯大富今天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一）蒯大富的“崇毛”

他在2004年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1〕

2011年发表了米鹤都对他的采访录，他在其中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确实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2〕

2014年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校友的一次聚会上又重申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样的说法。〔3〕这是被人称为“蒯十条”中的第二条。蒯大富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他对毛泽东的崇敬，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话来分析，毛泽东受到他的崇敬大致有两个原因：1）有魄力，敢于同强者斗，站在弱势群体一边；2）反腐败，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在笔者看来，蒯大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一个是基于他本人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所得出的、发自内心感情的评价，可以称之为“感情评价”，与我们以前常说的贫下中农因为翻身解放而对毛主席充满“阶级感情”类似。毫无疑问，蒯大富的感情评价中最重要的源头是毛泽东对他的“救命之恩”，即给他摘掉了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所加于他的反革命帽子，把他从政治的万丈深渊中解救出来，翻身成为全国造反派的旗帜。另一个评价因素是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包括政府对于思想舆论的导向和控制、民间各派势力对个人言论的影响等方面，“毕福剑事件”就是这类环境因素的典型表现。蒯大富在公开场合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自然要考虑到这种政治环境的约束，在以下讨论中，我们称之为“理智评价”。从以上两个因素来看，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来说，那些类似“毛粉”（无贬义，只是对一部分人的方便的简称）的言论出自蒯大富之口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应该看到，蒯大富今天对毛泽东的崇敬同他在文革期间的盲目崇拜有明显的不同。不同之处表现在，他只是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给予肯定，而对于用文革方式反腐败的思想已经不再认同。他说“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4〕

以上是蒯大富在被问到对毛泽东的认识时比较正式地表达的看法，是相当理性的。无论是对毛泽东整体的肯定，还是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批评，都同主流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正确”要求保持一致，也是他同那些一味崇拜毛泽东、要求回到文革的“毛粉”势力有所不同的地方。

（二）蒯大富的“怨毛”

蒯大富把毛泽东抬高到“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地位，这是他“崇毛”的一面，其实，他对毛泽东也有怨怼的情绪。经过了文革中被抛弃、文革后被囚禁的日子，他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内在矛盾也不是没有认识：“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5〕

也就是说，他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制度是一种“极端的集权专制”，这是他对“政治正确性”有所偏离的结论。得到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文革后思想冲破牢笼后的结果，在文革中他肯定是不敢朝那个方向去想的，当时只是“迷惘”和疑惑：“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就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

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6〕这说明蒯大富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选择性造反本质是“以我划线”，不过文革中严苛的政治环境和利害计算使他只是止步在“很难理解”这条底线后面。

更有甚者，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或者在谈论文革中具体事件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与理智评价冲突的感情表达。例如，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唐伟说：“我曾两次询问蒯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7〕——显然，他在理智和感情之间为难。但是蒯大富在某个场合曾经说：“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8〕可见，在感情上，他对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抛弃还是多少有点怨气的。那个抛弃他的“奴隶主”是谁呢？想必他心里是清楚的。

让蒯大富的被抛弃感和怨气最为强烈的，要数他谈论1968年7·27毛泽东派8341部队和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件事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没有事先告知耿耿于怀，他特别愤怒的是，因为自己被蒙在鼓里，他手下的“团派”不明就里同工宣队发生了冲突并导致人员伤亡。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蒯大富说：“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9〕

看得出来，蒯大富对于自己被蒙在鼓里的原因，也猜到了几分：对方是成心要引导他犯错误。这就在怨气之外还加上对成心者的愤恨了。不过，在公开的言谈中，蒯大富还是理智地避免把怨恨指向工宣队的派遣者毛泽东，而是指向具体实施的迟群和吴德等人，他多少有点“此地无银”地说：“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还欲言又止地说：“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10〕

他的怨恨最终只冲着迟群和吴德，最多对谢富治的行为有些“很难解释”，却“遗漏”了另一个同迟群一起带领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人——谢静宜，这种“遗漏”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机要秘书。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回忆：“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11〕可见谢静宜才是最早知道这次进驻行动的人物。根据2015年初出版的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披露，毛泽东在7月24日批发了中央关于制止全国性武斗的“七二四”布告，同时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农民队伍，去清华、北大制止武斗。“捅它这个马蜂窝。”他点名指责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羞耻。”〔12〕

上述回忆和其他史料都说明，是谢静宜直接从毛泽东口里领受任务，然后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做了传达，然后他们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做了报告。据迟群后来在清华的回忆，7月26日下午两点多，毛泽东

在其中南海住所，指着铺在地毯上的清华地图，向 8341 部队有关人员部署进驻任务。同日下午 5 点多至次日凌晨两点，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 63 个单位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吴德、迟群负责具体部署进驻清华的方案。（13）

这些事实，毛泽东本人在 7 月 28 日召见五大领袖的时候都老实告诉了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而且也承认了事先没有告诉蒯大富，“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14）蒯那边是气急败坏追问为什么不给他打招呼，毛这里却云淡风轻一句话对付过去。至于为什么不打招呼，他让蒯大富自己去猜。毛泽东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蒯大富还是傻傻地对苍天发问：“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可以说，这时他在感情上已经把怀疑投向了声称为“民族英雄”，只是因为“没有证据”，使得他到此止步而已。

事实上证据也不是没有，工宣队进驻清华的指令传递链由上而下是毛泽东—谢静宜—张荣温、迟群、吴德。这一点蒯大富在文革后不应该不知道。正因为他知道，才在自己的怨恨对象名单中有意剔除了谢静宜，蒯大富在这里是经过斟酌的，因为他明白，怨恨谢静宜，实际上就是怨恨毛泽东，这是他在理智上不能逾越的红线。

韩爱晶也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就派工人开进清华大学，不过他只是觉得“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这件事不是按往常解决重大问题的正常程序进行的。”（15）造反派在经过两年的文革洗礼之后，当然都懂政治斗争的原则之一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不过跟蒯大富一样对毛泽东“封建愚忠”（唐伟语（16））的韩爱晶不敢、也不愿以如此恶意揣测毛泽东。

在这一点上，同样参加 7 月 28 日召见、亲聆领袖训诫的王大宾对毛的感情也许不及蒯、韩深厚，所以更加直言不讳：“谢静宜的回忆书中披露，1968 年 7 月 24 日，……毛主席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有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有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毛主席预见：‘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事前不给蒯大富打招呼。有三万工人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预见。这就是毛主席当时事前的思考。”（17）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蒯大富没有被事先告知，并不是“错误”或疏忽，毛泽东为了不让蒯大富知道工宣队的行动，连派什么工厂的工人都考虑到了。唐伟说过，毛泽东在 1967 年武汉“7·20”事件后“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18）显然，他在 1968 年 7 月决定要结束蒯大富和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生命，耍的是同样的小手腕，所以他在召见时对蒯大富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轻轻带过，为什么不打招呼？通过谁间接打了招呼？连解释都懒得做。

王大宾也比蒯大富头脑清醒：“文革运动中，毛主席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运动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5·16’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19）

要说蒯大富真那么傻也不尽然，偶尔他也会流露出真实的想法。1970—71 年，他被召回清华接受“5·16”问题审查，他说“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

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20〕在这里他对自己被抛弃的怨恨已经不小心踩到了红线——他把谢静宜、江青和毛泽东都一股脑儿端出来了。也许他心里也跟王大宾一样明镜似的？

不过在大多数的场合，蒯大富始终坚守在红线后面，有时甚至对于自己被毛泽东抛弃表示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21〕这样的理解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并不能解释1966年7月27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如果只是因为不得已才牺牲他蒯大富的话，为什么要刻意瞒着他、引导他犯更大的错误呢？再说了，是哪个“右派”压迫毛泽东这样做的呢？

对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护主”之情，唐伟这样评论：“至死难悟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话叫犯了江湖大忌。老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22〕

蒯大富当年同系的研究生黄瑞和说得同样透彻：“文革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由皇帝发动的造反；不是反对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对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资派’官僚。当红卫兵造反派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皇上不再需要他们，就一反掌地把他们打了下去，最后也没有上台。因为这个台还是皇上和他的亲信占着呢。”〔23〕

（三）蒯大富对江青的评论

同蒯大富崇敬毛泽东相联系的是他对江青的态度，蒯大富在被问到对江青的评价时说：“江青女士在我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认为，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的8亿人口，尤其是女同胞里，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她的马列主义水平、组织和宣传能力都很强，还有她的书法，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非如此，我们怎么能解释毛泽东主席会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24〕在蒯大富看来，毛泽东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说明江青必有过人之处。

对于这一点，蒯大富的清华同学万润南这样评论：“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25〕

也有人对此有稍微不同的解释：“现在来看老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不就是充任叱咤风云、左右乾坤的‘五大领袖’之首的那几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阴，他此生岂不成了一团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阴，他就别无选择，势必得连带肯定把他亲手带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们。至于江阿姨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俗则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他是绝对看不见的。”〔26〕这样的分析，揭示了蒯大富被今日人们视为“毛粉”的深层原因——那是一种基于自我肯定的理性选择。他称赞江青的言外之意，大概也是想说，毛泽东当初挑选他出来树为全国造反派的榜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杰出才能。

但如前所述，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蒯大富从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弃的经历出发，对毛泽东在感情上有一定程度的怨恨，他对毛泽东推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文革前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中利用群众运动反官僚的做法，都有很多的反思和中肯的批评，这些言论说明他与正统的“毛粉”不同之处，让人觉得他在众多具体政策上对毛泽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至于他对毛泽东表达的那些崇拜言论，往往只停留在毛泽东的“高尚理想、良好愿望”层面，用“空前的”这一类大而无当的谀词作招牌，却没有提供可以实证的根据，在读者眼里，充其量是对毛泽东的抽象肯定。蒯大富这种“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映了他对毛泽东感情和理智两者之间的悖逆、他对毛泽东又敬又怨的感情纠结，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精致的政治姿态。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他在刑满释放后遭遇的坎坷、安身立命的不易，将自己的言行保持在“政治正确”的安全线内，是他在中国政治中的生存策略，我们应当对这种姿态给予同情之理解。对于文革后经过种种逆境回到社会上的某些文革造反派领袖人物，除了那些狂热赞扬文革、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以外，他们的“毛粉”言论，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四）蒯大富对周恩来的怨言

蒯大富的怨言，不仅有针对毛泽东、江青的，还有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在当前中国主流话语中毕竟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被抬到神的地位，所以蒯大富的怨言也不那么吞吞吐吐。他直言周恩来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幕后推动者：“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逮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27〕

总体而言，蒯大富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如上所述，他觉得自己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从1970年到1978年的八年时间一直背着“5·16”案子的黑锅失去自由，根子在于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周恩来，目的是整造反派。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感激周恩来在1966年7、8月间跟他彻夜长谈，倾听他对工作组的控诉。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周恩来是奉毛泽东的派遣而来：“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起来就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上面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来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前面向周恩来的汇报，关系很直接，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28〕因而他对周恩来的感激是不能同他对毛泽东的感恩相提并论的。

进一步说，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了反，但是在蒯大富后来创建“井冈山兵团”并发展为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主导力量的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远远小于中央文革，而且对他放纵手下的激进派骗斗王光美等事多有批评。特别让蒯大富不能忘怀的也许是，在1967年5月30日在清华大学革委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分钟，周恩来找借口建议推迟，使得清华大学革委会胎死腹中，从而大大鼓舞了反对派的士气。孙怒涛回忆说：“414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5·30革委会的流产，在蒯大富的心里结下了两个大大的仇。一个是对内，对414的。另一个对上，对周恩来的。如果说，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对周恩来的思想太保守，没有像江青那么激进有看法的话，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严重的创伤。”〔29〕那么，蒯大富所说的毛泽东在“右派”压迫下牺牲造反派，这里的“右派”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

（五）结束语

通观蒯大富在各种场合的文字和谈话，虽然不乏诚恳的道歉、到位的反思，也常有前后相悖、令人愕然的言论。究其根源，可以发现他一直深陷在“崇毛”和“怨毛”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在理智和感情的纠结中沉迷于自己昔日短暂的耀眼辉煌，看不清后来漫长的牢狱之灾以及坎坷人生跟先前的荣耀一样也是他心目中“空前的民族英雄”一手造成。倒是北京地质学院当年的一位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第一任夫人）比蒯大富和韩爱晶都要看得透澈，她这样概括这些文革中的学生领袖的经历：“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30〕

达到古宝琳这样的认识，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的。北京地质学院当年的青年教师宋翔雁，只是一个文革的普通参与者，他在回忆中谈到自己反思文革时所面临的困境：“在文革结束几近五十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31〕他在这里，用了痛心、难堪和痛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反思。文革的普通参与者尚且如此，涉入文革如此之深的蒯大富们要从“崇毛”和“怨毛”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在文革中“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其痛心、难堪和痛苦的程度，恐怕不是当事者愿意和能够承受的。

注释：

〔1〕〔24〕田炳信：采访蒯大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511f，2005年11月。

〔2〕〔4〕〔5〕〔6〕〔9〕〔10〕〔20〕〔21〕〔27〕〔28〕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

〔3〕蒯大富：在清华大学64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2014年4月25日。

〔7〕〔8〕唐伟：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载《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

〔11〕〔14〕〔15〕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3月。

〔12〕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13〕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16〕〔18〕〔22〕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3年2月。

〔17〕〔19〕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5年10月。

〔23〕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会议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

〔25〕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712e，2007年12月。

〔26〕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002b，zk1002d，2010年2月。

〔29〕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3年2月。

〔30〕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载《昨天》第63期，2016年1月30日。

〔31〕宋翔雁：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载《记忆》145、151期，2015，2016年。

2016年4月26日

【春秋史笔】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下）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 秦 晖 ·

（续zk1609a）

五，“知青下乡是巩固专政的需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事都标榜同样的意识形态理由，细看却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就以“十年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论，现在无论称赞的还是反对的，都把它与1950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来的知青史相联系，1968年关于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12·22“最高指示”发表后，“大有作为，很有必要”更常被连成简明的口号，认为这都是基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培养革命接班人、解决“三大差别”等意识形态动机。甚至连近年否定上山下乡的著作，也是把这些“极左思想”当作主要归咎对象的〔43〕。

但史实却是：1955年“大有作为”的那些人并非城市知青，甚至也不是乡村“小资”。按原资料的叙述，其实是郑县大李庄乡因为搞合作化，“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44〕。人家原来就是有点文化的“贫下中农”（其时去土改未远，“贫下中农子弟”尚未长成，贫下中农本身有人读书毫不稀奇），根本与城里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关，毛泽东那篇批语当时其实也是就事论事的，并没有提到什么思想改造之类的高调。1950年代作为样板的邢燕子、董加耕等也都是农家子弟，按后来毛泽东“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之说及此后的政策标准，这些人其实都不能算“知青”〔45〕。到了1960年代文

革前，城市知青下乡才渐渐兴起，但也还不是普遍运动，而主要是对那些被入了“另册”不能升学招工、甚至被认为不宜居留大城市的不幸青年的安排，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文革中曾引起过严重的抗争（如今的“人民文革论”者多提及这一点）。

直到1968年岁末，以毛泽东对甘肃会宁经验的“很有必要”著名批示为号召，上山下乡变成普遍性的大潮，很多地方甚至是“一片红”（全部毕业生都下乡）。尽管仍然存在歧视〔46〕，但因下乡的普遍性而一时不那么凸显。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68年岁末之前，一些有影响的城市红卫兵闻人多次发起自愿上山下乡行动，如著名的蔡立坚、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他们的发起正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高调——但并无接受“再教育”的自贬色彩，而是要到农村去传播毛泽东思想，与农民一起“大有作为”，乃至带动农民干革命——就像毛泽东等当年激进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那样。但是，毛泽东并未为他们讲什么话。

而会宁县的做法却显然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毫无关系。那是一篇鼓吹为“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性减少城镇居民（包括老幼妇孺、残疾人士，却并未特别提及学生）的文章：当局为“使职工家属……走大庆家属之路，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动员全区职工家属和闲散人员到当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区各县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动员安置”〔47〕。文中最突出的典型是个文盲老太太、已故老工人的遗孀：“时年54岁并身有残疾的王秀兰率全家于1968年7月到河畔公社落户，成为轰动全国的有名人物。……1979年2月王秀兰全家返回县城仍为居民，同年6月病故。”〔48〕王秀兰已故丈夫和两个儿子是县城的工人，在当局的此次动员中她带着两个儿媳和孙辈注销城镇户口迁居农村。据称这位既谈不上“知识”也非“青年”的文盲老太太曾豪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当死狗。”记者觉得“死狗”之说不雅，在文章中改为“不在城里吃闲饭”。毛泽东亲自细读了全文，又御笔改为“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钦定为全文总题在1968年12月22日刊于《人民日报》〔49〕。于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轰动全国，而与会宁经验一起登上全国报刊头版头条的、关于城里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也吹响了普遍性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我们看到，1955年的大李庄乡和1968年的会宁县事例有着强烈的反差：前者回乡的本来就是“贫下中农”，而后者是强制遣散城市居民，前者虽为农民但毕竟是上过学的年轻人，还可以算是“知识青年”，后者那文盲老太太也能算吗？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两者说的都不是城里学生下乡的故事。而曲折、何方方们做的才是那种事，而且确实以意识形态为动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为何对青年学生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自觉的上山下乡毫无反应，却在一个并非“知识青年”的文盲老太太那里发现了上山下乡“很有必要”？

其实从意识形态角度讲，王秀兰老人的话是适于大肆宣传的吗？“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已届退休年龄的残疾老人竟然不能“吃闲饭”，否则就是“当死狗”？“减轻国家负担”要减到一个已故老工人的残疾遗孀的头上？老人本来就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贫寒人家，她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老太太的儿子们在城里工作，儿媳们却被动员下乡，置家庭人伦于何地？她还带着年幼的孙辈下乡，这其实也很“正常”：当时16岁以下的“知青”成千上万（笔者即是其中之一），整户下乡的居民家中未成年孩子更多，这些人也不能“吃闲饭”？这不是鼓吹童工制度吗？

显然，毛泽东对曲折、何方方等人的倡议不感兴趣，却选择会宁县和王秀兰这样的典型来带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这

从意识形态讲是根本说不通的。那么毛泽东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这没法实证，但笔者提出以下的逻辑分析，读者看是否合理吧。

首先，会宁经验为“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性减少城镇居民的安排很受毛泽东欣赏，这与那种认为大规模知青下乡是因为要摆脱就业困境的“实用主义”解释是吻合的。

但是毛泽东想的当然不止于此。他把“不在城里吃闲饭”加一字改成“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原来很上口的“七言诗”句变成了拗口的七、八字文句。“城里”变成“城市里”，明显体现毛泽东的用意主要在于大城市，而不是在会宁这样的小县城。我们知道在1968年末，毛泽东已经对“造反派”卸磨杀驴，“轮到小将犯错误”了，所以他对曲折、何方方等红卫兵闹人的主动下乡是不屑的：什么“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什么知青下乡就像新的“长征”，是去传播革命火种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50）？你以为还是受宠的“小将”？现在你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不是你们要怎样，而是我要你们怎样。而“会宁经验”恰恰是个强制动员的经验，因此深得圣心。毛泽东的批示就明言：“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这里的“知青”不仅不被当成主动者（尽管现实中有些知青极力表现主动），甚至连“说服动员”的对象资格都没有：领袖要说服动员的是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就像以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一样！要说初中生可能还有未成年的（那把他们送到农村也有童工之嫌），而“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显然都已经是有自主权利的成年人，那也是完全可以“说服动员”了家长就可以被“送”去的？

显然，正是这种强制动员模式与会宁的做法吻合。尽管本来会宁的强制动员对象是小县城里包括残疾文盲老太太在内的“闲散人员”，并非特别针对学生，但毛泽东看中这种动员方式却主要意在大城市的学生。这就是本与毕业生下乡没什么关系的会宁经验被毛泽东突兀地用作号召前者的由来。而这些学生不是别人，正是1966—1968年被毛泽东“发动”起来在城里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如今城里百业凋敝，升学就业无门，习惯于造反的“小将”们在为毛泽东火中取栗后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如果不被打发掉，“后文革秩序”如何建立？在发现会宁经验前，工宣队（农村是贫宣队）进驻学校已经把学生们弄得灰溜溜的，现在用会宁经验打发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各奔东西，也就实际上取缔了“红卫兵”组织，过些日子再找个“五一六”之类借口，把那些失去组织依托、已成孤家寡人的造反派头头们抓起来就方便了。把这一宏观过程联系起来看，就无怪乎贵州、湖南等地在宣传毛泽东指示时提出的口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如果去掉“阶级”这个意识形态装饰语，可真算是心领神会了。

六，“理想”可以各式各样，只要不择手段，都会变成灾难

但是，笔者进行上面的论证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没有“理想”，也不是说这种“理想”不够伟大，甚至笔者都不想批评他的“理想”不现实，属于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确，通过以上事实我们不难论证，毛泽东的种种作为首先都是为了他自己夺取和巩固权力。但是他要这么大的权力做什么？如果有人说是他“志存高远，雄才大略”，想让“中国崛起”，乃至要“解放全人类”，带领世人共赴天堂，我是不会去质疑的。

尽管如前所述，一个人心里实际想些什么，别人谁也无法实证，但是通常人们都相信，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感官层面的物欲、情欲和其他生物性欲望，或者用毛泽东的说法只是为了“低级趣味”的享受，他实在用不了那么大的权力，更不必不顾一切地无止境追求更大的权力。这对任何暴君都是适用的。一个皇帝，他自己或家人哪怕穷奢极欲，又能吃多少，穿多少，用多少，玩多少女人，住多大的房子？从大国和天下的角度看，这点负担未

必就是灾难，仅仅为了满足这些民间富豪也能实现的欲望也未必需要无限弄权。更何况暴君们喜欢声色犬马奢侈享受的固然很多，但绝非皆然，一些元恶巨恶其实并不看重这些“低层次”欲望。林彪最想吃的不过是炒黄豆，希特勒连孩子都没有，波尔布特也不是个很奢侈的人。

心理学家马斯洛有所谓人的需求或欲望的多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归为五个层次（有时也归为六个或七个），分别是：生理需求（衣食住和性欲之类）、安全需求（消除风险、降低不确定性和寻求保障）、社交需求（友谊、爱情等）、尊重需求（他人对自己的看重、荣誉、名声等）和自我实现需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雄心壮志）。一般地说，如果统治者只有低层次欲望，他会成为庸君昏君，而如果要成为“暴君”，则往往与英明君主一样是重视高层次欲望的。从开疆拓土、廓清宇内，杀富济贫、人人平等，振兴民族、“优化”人类，直到世界大同、人类解放，所谓好大喜功、狂妄自负、野心勃勃，和雄才大略、伟业宏图、凌云壮志，都只是他人价值判断的褒贬不同，就马斯洛的欲望层次而言，那都是在追求“理想”，属于最高层次的人生目标。暴君与英主一样未必会像他们往往标榜的那样“脱离了低级趣味”，但可以认为他们不会满足于“低级趣味”——他们都是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

那么，我们何以区分“野心勃勃”与“雄心壮志”、区分暴君与英主呢？喜欢谈道德的国人常用的一种标准，是辨析这些“理想”中是否杂有私念私欲和私利，“大公无私”的是伟大领袖，假公济私的是窃国大盗。但是这种标准其实意义不大。首先私欲如果是指鲜衣美食华屋艳色或马斯洛所谓的低层次欲望，那么史实中不仅暴君有清心寡欲之例，所谓的英主七情六欲也未必亚于常人。尤其是近年来一方面专制依然，另一方面“走下神坛”之说变成时髦的背景下，领袖有圣人之权却只负俗人之责已经成为为专制辩护的一种新理论。正如有人谴责的：“你可以追求当官，也可以追求发财，但你不能通过当官来发财。你可以争取当圣人，也可以只想当俗人，但不能指望人们既承认你有圣人的权力，又像对俗人那样原谅你的罪错。”如今有些人一面宣传领袖崇拜，一面又以“领袖是人不是神”的遁词来为之文过饰非，抛开该不该不谈，至少在事实层面人们已经明显降低了对领袖的道德期许，又何谈“大公无私”的英主？

更重要的是，只有低层次欲望才是“私欲”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求恩立边功”、乃至为“换来”理想实现而不惜牺牲1.8亿人就不是？按马斯洛的欲望多层次理论，追求“理想”和“抱负”不但也是私欲，而且是私欲的最高层次。当然这里先要破除对“私欲”的污名，追求鲜衣美食和追求一统天下，本身都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大好事，但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乃至为追求自己的衣食或“理想”而不择手段地害人，那就坏了。私欲的低层次与高层次或许有影响大小之别，但本无善恶之别。不害人而谋衣食是小善，不害人而谋天下可能是大善。反之，损人以图衣食是小恶，而害人以图天下那就是大恶了。

有人可能会说马斯洛所言不足为据，但其实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更直白。他在1918年对泡尔生《伦理学》的批注中曾声称自己主张“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未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所以遂其生活，则仍是利己主义也，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不过易其手段而已。”（51）毛泽东虽然没有马斯洛那样的欲望“层次”之分，但也明确地认为从“利己”到“利他”、从谋衣食到“建功业”都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不同“手段”。

所以，在追求“理想”和追求私欲之间进行区分，实际是不可能的。你有某种理想，别人未必认同，别人有另种理想，你也未必认同。你自己为你的理想献身，那是求仁得仁，但你要别人为你的理想献身，难道就那么高尚？难道就不是一种更极端的自私？

于是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场景中有许多暴君僭主，乃至独夫民贼、元恶巨奸，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传奇，他们的个人生活有的纵情声色，有的清心寡欲，他们的思想渊源五花八门，各有所本，他们各自的理想蓝图与宏大事业可能千姿百态非常不同：从秦始皇式的扫平六合大一统“家天下”，到自称“我无后乎”的毛泽东宣布要搞巴黎公社式“大民主”；从希特勒以日耳曼民族至上来“优化人类”，到斯大林以“无产阶级”至上来达到世界大同；从尼禄为再造“大理石的罗马”而放火焚城，到波尔布特为“纯洁社会”而以大屠杀再造“人民”；从塔利班头头为独尊伊斯兰神圣信仰而炸掉人类遗产巴米安大佛，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为独尊“唯物主义”神祇而踏平阙里“刨平孔坟”……。但在不同“理想”旗号下，只要不择手段，他们实际做出的旷世恶行却是似曾相识非常类似：鼓吹效忠个人、暴力铲除异己、禁锢思想、消除多元、独尊唯一（唯一领袖，唯一组织，唯一信仰乃至唯一血统）、大规模群体性迫害，乃至集中营、大屠杀、大饥荒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当然他们都可以宣称这个“自己的目的”超越了（有时也确实超越了）一己的“低级趣味”，是出于“大公”的目的，但就像我们前引的马斯洛和毛泽东所说，这种独夫认定的“大公”其实不过是个人的欲望的“最高层次”或最高“手段”而已。对于这样虚伪的“大公”，西方左右各派思想家是怎么批判的，这里就不提了，其实“中国文化”中对此就有最精辟的抨击，如明儒黄宗羲所言：古之圣王，允许“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而圣王自己却不自私不自利，而是克己为公，比别人勤苦“千万倍”“而已又不享其利”。梨洲先生说，这种事一般人是不愿干的，那愿干的自然就是真圣了。而现在的君主却正相反，他们“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你们都必须无私地把一切奉献给国家，而国家即朕，朕即国家，也就是一切都奉献给皇上我，乃至“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真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52）！好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是大善呢，还是大恶？

另一些人并不以领袖的“大公”是否包含私利作为评判标准。他们就是前述的“领袖是人不是神”论者。在他们看来，领袖有凡人的私欲并不足怪，只要他们的宏大理想“客观上”是好事，比如具有合乎历史规律的“进步性”或者有利于多数人的“正义性”，那些“代价”，其中包括因领袖凡人私欲而发生的代价，就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笔者要指出，如果不考虑“代价”和手段，一种理想是好还是坏实际上是无法判断的。尤其因为人类存在着种种利益矛盾，对某些人而言的好事对另一些人可能就是坏事，反过来亦然。我们应该以哪一方的标准论好坏？以“多数人”的标准吗？常识告诉我们，仅以受损受益二者人数的多少来“权衡利弊”也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的“理想”是人类“优化”，因此为了“优秀民族”就要消除“劣等民族”；斯大林的“理想”是世界“赤化”，因此为了“先进阶级”就要镇压“反动阶级”。而“优秀民族”雅利安人是多数，“劣等民族”犹太人是少数，正如“先进”的无产阶级是多数、“反动”的资产阶级是少数一样。我们可以因此认为那就是一种“好”理想吗？

还有些人的标准不是受益受损者的“多少”，而是这种理想是否行得通。现实可行的就是“好理想”，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就是“坏理想”。他们认为许多的灾难，包括“大跃进”这样的“人祸”，“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都是追求“乌托邦”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一切的灾难来源于“理性的自负”、“人道主义的僭妄”，“‘最好’（或‘更

好’）是‘好’的敌人”、“人间的天堂就是地狱”、“通往地狱之路由善意所铺成”……。似乎善意，至少是“过分的”或“不切实际的”善意倒是万恶之源了。

但是认真想来，什么叫做行得通，什么叫做行不通，似乎也很难断定。例如从金日成到金正恩，金家在朝鲜的“理想”已经实行达三代之久了，你能说它是“行不通”的么？当然你可以说那不是“好理想”，但那又回到我们上面所讲的理想“好坏”的判断困境去了。或者你可以说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初追求的“真理想”，但是你怎么知道金日成当初追求的并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你可以说金日成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朝鲜现在其实已经不讲马克思主义，他们现在只讲“主体思想”，这“主体思想”是不是一种“理想”？它能说是“行不通”的吗？如果金日成当初追求的就是如今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又已经实现了，那就值得肯定吗？

七，“理想”可以千奇百怪，只要持守底线，就不可能成为灾难

反过来讲，无论什么样的理想，如果只是信仰者用以自律自励，哪怕赴汤蹈火，虽九死而无悔——但不强人所难，更不以他人为牺牲，那又有什么可非议的？

曾经有人说，中国人民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业的产业特性不适用于集体生产，所以农业合作化应该限于流通领域与产前产后服务领域，如果搞集体生产，那就是“乌托邦”。低效率、大饥荒等等，都是“乌托邦”之害。

但笔者曾经考察过以色列的几家基布兹（Kibbutz，即希伯来语“公社”），那里不仅是集体生产，甚至连“家务劳动”都是高度“集体化”的。典型的基布兹实行公共食堂和儿童公育制，分配也是绝对平均的供给制，后来发工资，也是完全均等的。其“共产主义”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而这几家基布兹都有骄人的经营绩效和丰裕的社员生活。想到公社在我们这里的失败，想到公共食堂在我们这里几乎是大饥荒的代名词，不禁令人感叹。

当然，基布兹也有办得差的。历史上基布兹曾经历过相当普遍的严重财政危机，不少基布兹或者散伙了，或者“私有化”了，或者转制为较为松散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经济组织如莫沙乌（Moshav）、米苏拉乌（meshulav）和米塔迪什（mitadesh）等。“散了也就散了，保留下来的都是办得好的”，一个以色列朋友对笔者说。

那么“保留下来办得好的”比例有多少呢？德语维基百科 Kibbutz 词条给出的数字是 1990 年基布兹数量达到高峰，当时有 270 个基布兹，人口 12.51 万，到 2001 年还有 267 个，人口 11.55 万。《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20 世纪末基布兹拥有以色列犹太人口的 2.5%，而在 1947 年这个比例是 7%。（53）当然，由于以色列犹太人口增加很快，现今的 2.5% 比 50 年前的 7% 代表的绝对人口数是更多的。而权威的基布兹数据库则显示，基布兹人口峰值是 1994 年的 12.46 万，到 2005 年仍有 11.77 万。就相对比例而言，2005 年基布兹人口占以色列犹太乡村人口的 24.1%，犹太总人口的 2.09%，以及全国总人口的 1.68%；而这三个比例的峰值分别是 1983 年的 35.1%；1952 年的 4.7% 和 1952 年的 4.2%（54）。总的来看，经历 90 年的发展，基布兹运动先升后降，但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峰值时的绝对规模，相对比重下降主要是因新移民的大量增加所致。

这使我想起了国内左派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华西村、南街村这类坚持不分田到户、走集体经济道路的“红色典型”。说这些村的经济比小岗村搞的好，笔者是相信的——尽管自由派朋友往往强调那是当局基于意识形态理由给予照顾的结果，或者说是引进“资本主义”、

剥削外地劳工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就这些村的户籍村民而言，笔者相信他们是感到了“不分田”的好处的。不仅如此，笔者还相信今天中国这些仍然搞“集体经济”的村庄，一般而言“明星村”的比例较高，总体上经济水平也应该比一般“单干”村要强。这有什么奇怪呢？自从1970—80年代之交中国农民有了退出“集体经济”的自由以后，办得不好的集体就留不住人了，还能留得住人的，自然就是办得好的。如果办得不好还强行扣押住人不让走，那就不是“明星村”与否的问题，而是违法拘禁的问题了——说得极端点，如果套用犹太人的历史，那就是奥斯维辛，而不是什么基布兹了。所以，解释华西村的逻辑，应该是“因为办得不好的集体都垮了，极少数能够剩下来的自然就是好的”，而不是“因为华西村办得好，所以当年就不应该允许全国农民选择去留。如果一直把他们扣住不许走，全国农村就都变成华西村了”，这后一种逻辑是奥斯维辛的逻辑，不是基布兹的逻辑。

换言之，在自由选择的状态下搞“乌托邦”，那逻辑就是“散了也就散了，保留下来的都是办得好的”，无论中国还是以色列，这应该是一样的。问题是“办得好而保留下来的”能有多少？

在这一点上，中、以“集体经济”的差别就太大了：在自由条件下经历90年的风风雨雨，基布兹大体还能保持可观的凝聚力，今天的规模比峰值差不了多少，散掉的是少数。可是中国呢？改革前全中国农村都是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共有95万个生产大队（相当于后来的行政村），到了本世纪初，仍然不分田的集体经济只有7000多个行政村。这也就是说，1956—1980年间中国的“集体经济”在强制状态下经过二十多年惨淡经营，仍然没能对农民产生吸引力，当农民获得选择自由后，他们99%以上都选择了离开！难道这还不够失败？任何经济类型都会有些能够吸引人的个案。当年被认为很不堪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农业，经历了几十年转型后，如今仍有近半数的土地是集体经营（当然那已经是自由的股份制农业企业了）；拿破仑当年在莱茵地区解放农奴，但据说半数以上的前农奴在获得自由后仍然不愿离开庄园；甚至美国废除黑奴制后，选择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自由雇工留在种植园工作的前黑奴也有30%左右。而我国的农民在可以选择离开后，仍然愿意留在“集体经济”中的却连1%都不到，还有什么样的失败能甚于此呢？

显然，我国人民公社的失败并非因为它是“乌托邦”，而是因为当时的体制不择手段地把农民捆绑在“集体”中；而以色列的基布兹其实比中国的公社还要“乌托邦”（集体主义精神更强，经济公有化平均化程度更高），但是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办好了功德无量，办不好散伙就是了，怎么会造成灾难呢？所谓乌托邦，如果不拘泥于托马斯·莫尔那种具体描述，其实无非就是指“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何谓“无法实现”有时并不容易判断。无论欧文还是基布兹的实践都证明，有不少理想在所有人中难以实现，但在部分人中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其实现也无害于他人，那么它们是应该否定的乌托邦吗？更何况，即便确实无法实现，但“无法实现”就一定会造成灾难？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追求尽善尽美，能达到较善较美也不错。当初赫兹、本—古里安等犹太先贤是把基布兹模式奉为理想的，但他们没能在以色列普及基布兹。在“理想”的时代，以色列乡村犹太人中加入基布兹的也只有40%左右。然而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巨大正面作用是谁都承认的。至少，基布兹没有给以色列带来灾难，这样的“乌托邦”有何可怕？

但如果号称追求尽善尽美，而实际却落入尽恶尽丑的陷阱，那又是为何？由此想到我们的文革，毛泽东搞文革是因为他有“乌托邦”思想吗？那开创以色列事业的一代犹太先贤，如本—古里安等难道就没有“乌托邦”思想？只不过，本—古里安为自己的理想身体力行，他来自基布兹，作为以色列开国总理建立了丰功伟绩，卸任后拒绝了优厚待遇，又回到了内盖夫沙漠中他参与建立的基布兹家园，至今他夫妇的墓地仍在那个游人很难去瞻仰的沙漠腹

地。但是本一古里安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以色列人都强制驱赶进基布兹，更不会去追求为此必须的无限权力。而毛泽东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他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但马克思的理想与秦始皇的理想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知道他离何者更近），但他为此既可以“牺牲左派”也可以“牺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资派”，更可以让“走资派”去屠杀“造反派”，亦即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是不择手段的，而且首先是为谋求“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所需要的无限权力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探讨文革这类历史问题而言，大人物的“手段”比“目标”更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思想史研究”，但即便对于思想史而言，研究毛泽东何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模式，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恐怕也远不如研究他何以培养出“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想法重要。而这确实有待于分析他的人生心路，以及滋生出这种心路的世道土壤，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635—36。

2，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485，另可参见<http://www.xiexingcun.com/maozedong/mym024.htm>；张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新发展》，《前沿》2011年第20期，页43。

3，《真理报》，1963年9月22日。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页393—94。

4，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8张。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页395—96。

5，《真理报》，1957年11月19日。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页394。

6，张春桥猜不透毛泽东心思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1966年毛泽东生日宴上，毛举杯“为全面内战而干杯”，张春桥就纳闷了一辈子，26年后他还对女儿说：“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参见《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页128。

7，文革研究界对“十年文革”说历来有争议，但分析毛泽东这十年的行为不必在乎其是否叫“文革”。

8，32，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2；2、26；6—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241。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99，1084，1088。

11，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22—25。

12，笔者对此曾有初步分析，见秦晖：〈文革之谜：关于文革的若干问题〉（2012年12月8日），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25946>。

13，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页44—45。

14, 笔者对蒯大富的访谈, 深圳, 2013年6月23日。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过多次文字表述。

15,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页175—85。下引谢静宜回忆录均同此注,不再另注。

16, 李仕林:〈朱勇访谈录〉,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页677—96。

17, 转引自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347。

18,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页180。谢静宜说的是三万人进驻后毛泽东对“市领导”约束宣传队活动的批评。但实际上从全文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24日决定“捅马蜂窝”时就主张宣传队在清华可以为所欲为、去所欲去,只是“市领导”没有领会他的旨意,还有点放不开手脚,致引发毛泽东的恼怒。

19, 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页80—81。

20,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香港:香港和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光盘收录文本。1967—68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21,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参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2, 清华四一四派当时有条情报,说是蒯大富认为“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参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收录、大事日志》,(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页372—373,1968年7月23日),蒯大富自己不承认说过此话,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能够佐证他说过此话。但作为一种形势分析,当时有这种判断的人其实很多;各省造反派都有严重的危机感。

23, 参见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参见《历史拒绝遗忘》,上册,页1—36。

24,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对此都有回忆,只有王力说毛祝的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其余四人的回忆都是“全国全面内战”;戚本禹认为王力所说不确,参见《戚本禹回忆录》,下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页543—55。

25, 参见秦晖:《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1968年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待刊稿。

26,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指“无人受损、人人获益,只是获益程度有大小”的改变,笔者据此给出“负帕累托改变”的概念,即“无人获益、人人受损,只是受损程度有大小”的改变。

27,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领导者》,总第68期(2016年2月),页127—136。

28, 29, 41, 何蜀:〈“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昨天》第69期(2016年5月30日),页37;36;44。

30, 36, 孙言诚:〈“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昨天》第69期(2016年5月30日),页19、21;20—21。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597。

34, 35,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页85—86,149—50页。

37,〈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8—1976年卷补遗二,页290。

38,〈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1967年1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09。

39,毛泽东审定时将原排在第四篇的此文移作头一篇以示强调,参见〈对《红旗》杂志社抡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968年10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580页,注2。

40,康生说:“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什么叫‘反复旧’:‘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1969年12月27日)。参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67)》光盘。

42,张云生、张从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页35。

43,最近的代表作就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该书为享誉国际学界的名著,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个创见是用知青运动期间劳动力反向流动(农民变工人)来证明上山下乡的主因并非为了解决就业困境而是为了意识形态。但笔者认为: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除这两个目的外,遣散造反派恐怕是更重要的目的。考虑这个目的后,一方面打发红卫兵下乡、一方面吸收农民为工人的现象就不一定非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了。

44,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郟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转引自林霞虹、罗桦林:〈麦田里守望逝去的青春〉,《广州日报》,2008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是在关于郟县的这篇文章上写下“大有作为”那番批语的。

45,后来也有“回乡知青”之说,但那只是民间的说法,所谓“知青办”、“知青政策”等官方说法是不承认其为“知青”的。

46,尤其在并非“一片红”的地方,如广西,不仅有过去的歧视(能招工参军的都是有好“背景”的人),还有因文革产生的派性歧视。

47,49,参见黄建祥、赵平:〈对一句经典口号的考证〉,《人民政协报》,2012年8月9日,B1版。

48,对王秀兰的介绍,参见新华网甘肃频道,

www.gw.xinhuanet.com/hn/2007-11/21/content_11732262.htm。

50,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108—12页。

51,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203、205、240。

5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页2—3。

53, Judy Peres, “In 50 Years, Kibbutz Movement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Chicago Tribune, May, 9 1998.

54, Avraham Pavin, The Kibbutz Movement: Facts and Figures (Israel: Yad Tabenkin, 2007), 6—7。

□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

## 【千秋功罪】

关于文革的定性  
——写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念日”前

• 段协平 •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以雄视千古、睥睨一切的毛氏风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不世之功”面前，他大概也不屑于所谓伟大的谦虚。

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更费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干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写脚本的是他，总导演也是他，制片人还是他，可谓在兹念兹、情有独钟，宝贝得不得了。以他对《二十四史》兴亡治乱炉火纯青的研究和犀燃烛照的洞察力，怎么可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重复的还是皇上圣明、奸臣弄权的老故事，无意间对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来，官家说辞，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终究还是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但无论如何，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达成共识。持异议的人不是没有，但无非是两岸的猿声，是秋后的蝉鸣，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是马克思所讥讽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没有什么严肃的人把它当成正常的声音了。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

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循此，说“文革”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的期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

“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李先生所言极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泽东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折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先生讲的。毛泽东也有鼓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个场合下号召共产党人五不怕，所谓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云云。

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一男儿！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怀仁堂拍案一说，那就基本上是在重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所讲述的故事了：“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得到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保驾护航。笔杆子在前，各种舆论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文革”摇唇鼓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贩卖的无不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个人迷信等这些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与邪教，干尽了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等伤天害理的勾当，颠覆的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与常识。公检法居中，对“文革”对象和不满“文革”者全面张网。当时有砸烂公检法一说，但砸烂的无非是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两道防线。没有辩护，辩护就是犯罪；没有审判，审判就是言出法随。此后，公检法合署办公，按照“公安六条”行事，沾上这六条的边，就能下狱乃至杀头。莫须有，并不是秦桧的专利。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凡是两千年来专制发明的构陷都派上用场，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达于极致。至于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则完全失控，令人发指。殿后的是军队，所谓支左，支了什么，过来人心里都有数。

“文革”还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虔诚和狂热的拥护。这等于是上面说，你们自残吧，打自己的脸吧，这是练功，能强身健体。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扇自己的耳光，还恨不得拿砖头砸自己的脑袋；上面说，你们一起往沟里跳吧，那里是天堂，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唱着赞美诗奋勇争先往下跳；上面说，你们大家互相掐架吧，其乐无穷。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掳袖照准对方的软肋猛下狠手。当其时也，不

是没有清醒的人，可惜经过多少年的洗脑，已经很少，还无一例外都被捆绑住手脚、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样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挣脱了精神的枷锁，告诉大家皇帝没穿衣服，也被认为是疯子、恶魔。全民脑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罪错不能全部归于毛泽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总括以上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还匍匐在神的脚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声声吾皇万岁。告密亲人成了忠诚的代名词，同族相残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奖励，假话已经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洋相，一时成了时髦。几千年古国文明包括人类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尽。这种自淫自残、自乱江山，自掘坟墓的蠢事，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地干，理直气壮地干，信心满满地干，唱着赞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国主席、解放军两位元帅、大批社会精英，以及无数被打入另类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关的关了，没关进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我统计了一下，那十年，被杀害、自杀、整死和失踪者，高达21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国军牺牲350余万将士相比，该做何感想。如果考虑到叶剑英作报告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虑到“文革”期间几乎无档案可言，210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说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显，在“文革”期间，举国几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说是国耻，并不为过。顺便说一句，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林昭被杀害后警察向其母亲索要子弹费、钟海源被活体取肾，随便哪一例，都够得上国耻。

回到李慎公话题上，国耻和国难，按照我的理解，区别就是在自为的还是他加的。国耻者，自导自演自作孽也。国难者，老天爷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说句题外话，“九·一八”事变是国耻，还是国难，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说是国耻，也是日本的国耻。当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应该刻上那个不放一枪就逃窜到关内的浪荡公子的名字。

说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也没能把他们的铁蹄伸向黄河对面的延安乃至更广大的西部地区，“文革”制造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却无远弗届。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再怎么艰难，也还能让教授们教书，学子们读书，“文革”十年，举国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吴晗、傅雷、卞仲耘们，能走出国难，却走不出史无前例的造反岁月。

一个国家在集体发疯，国难耶，国耻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鸣笛以警示国人莫忘国耻，那么，对“文革”，该不该确定一个日子，以警示国人？如有必要，那么，1966年5月16日，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知发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都有资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国耻不足畏，知耻而后勇，怕的是讳疾忌医。以史为镜，不重犯“文革”错误，这一课似乎应该补上。

□ 原载《共识网》

~~~~~  
【往事非烟】

我的1966年夏秋

• 郁 琪 •

我的六年中学生活，都是在天津三十四中度过的。1966年我正读高三，准备高考。5月毕业考试结束；6月中旬，仲夏，高考制度废除了。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之风盛行，学校是重灾区之一，批斗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邵淑惠先生是我们的校长，其夫王金鼎是市委文教部部长（他们夫妻都是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的），因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丈夫的“功劳”，自然有妻子一半，校长在劫难逃。学校文革前高考成绩是不错的，校长曾经以历届高考成绩自豪，这当然又成了文革开始后的主要罪证之一。批斗会上打倒校长和她丈夫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红墨水、蓝墨水，从眼镜片上流下来，拳脚加在她单薄的身上。

批斗老师也愈演愈烈。老教师们大多是解放前大学生，很少有“成分好”的。我们的数学老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小姐，沥青之类涂抹到被剃光了的头上。语文老师上课曾经涂脂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思想，需要好好改造！她被逼迫到学校楼房二三层间外墙、一砖多宽窄的地方走一遭，浑身打颤。我们的班主任善良可亲，业务精湛，也被揪斗，被剃成“阴阳头”，脸被打得肿了起来。英语老师，政治老师……无一幸免，被打成“牛鬼蛇神”，关到学校地下室的“牛棚”中。

又有传来消息，市一所男子中学批斗老师够水平，学生们立即去取经。偌大的操场好像在吊丧，若干长长的白色魂幡在晃动，幡下也是一片白色，“牛鬼蛇神”们穿着丧服，敲着锣，转着圈，一片乌烟瘴气，真让人望而生畏。红色恐怖，革命风暴，席卷天地。这样，我所在中学被认为批斗力度不够——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是不能“温良恭俭让”的！

红卫兵冲出学校、涌上街头，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批斗也接二连三降临到同学们父母身上。黄家花园山西路口李铁匠的一位女儿是我的同学。她父亲公私合营以前开了小铁铺，是不是有一两个伙计，我不清楚；只知道开个小门脸，楼上住家人，她兄弟姊妹十几个。小私有者在那时等同剥削者，他们的家什，被红卫兵从楼上窗口稀里哗啦抛了下来，堆放到报刊亭前的十字路口当中，继而被点燃。纸簿被认为是“变天帐”！大火熊熊……我同学的长辈们，都被逼迫跪到竿拨作响的火堆旁，满面通红，几乎烤出油来！看到那一幕，我真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啊。

另一位住在长沙路思治里的同学，父亲是小资方，那时候只要公私合营以后拿利息的，都是资本家，哪怕拿一盒纸烟钱的利息！同学的父亲老实巴交，红卫兵找不出他的任何罪状，就成了“反动”资本家的陪斗。批斗会很多，陪斗也很频繁，他胆战心惊，难以禁受耻辱和煎熬。在一次批斗会之前，在家里的地下室悬梁了！那时候，自杀就是抗拒革命。一家四口（母亲和三个孩子）失去了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同学母亲被剃头之后去扫街。她是小脚（幼年时被缠足），身体很单薄……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精神压力折磨着她，不久就病倒了……当同学的母亲故去的时候，同学也因病住院，母亲病故的噩耗传来，她不顾一切从

医院奔跑回家，晕倒在另一张床上，被伤心欲绝的同学们抬回医院。后来，这位同学也离我们而去了，是班里第一个离去的。她的学习曾经很出色……

我的另一位同学，父亲曾经在黄家花园西安道开五金行，当然在被批斗的资本家之列……当时这位同学说了一句话：“我家开五金行的房子原来是XXX家的汽车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一个中学女孩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XXX，指的是我！如五雷轰顶！外公曾经是民国外交官，出任过英国伦敦总领事……这些我当时并不很清楚，母亲一直隐瞒着我。但是，同学家开五金行的房子原来是我家老宅的汽车房……这我是清楚的！我担心着哪一天火山喷发，真有如白天出穴的小鼠，惊恐万状，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幸！外公去世得早，这事后来没有掀起惊涛骇浪。

我所在的三十四中校舍，曾经是民国要人曹锟在天津的府邸。气派的三楼一底西式洋楼，（在唐山大地震后不复存在，我竟然没有留下学校全景照片。）文革开始以后，地下室就成了“黑五类”写检查的地方。我的罪状是父亲在国外，在国外的罪名一律是“投敌叛国”。（在中学六年里，无论我如何努力，都因为家庭问题不能入团！）……检查一遍，又一遍，被认为不深刻，不彻底。怎么深刻呢，在国外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背叛祖国，投敌叛国！似乎是科学的等量替代，不知道合乎什么逻辑学。每天从早到晚，只能做一件事，写检查，写检查！学校一次次组织全校同学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没有资格；到全国各地串联，也是不可能的。我十几岁的心灵，不知道曾经承受多么大的压力！阴森森的地下室，写不完的翻过来倒过去的检查，要上纲上线！万般无奈，我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父亲在国外，不可能被揪斗了。我十分担心母亲，怕她像同学父母一样惨遭劫难。然而天佑母亲。母亲所在工厂前身，是广东人开的贸易行，招收的大部分是老广，几乎家家有海外关系。母亲又不是资方，所以，没有像我一样写检查。从科室干部下放到“要害部门”，在食堂劳动！

8月26日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9月18日，市一中等16所学校在体育场召开揭发市委大会。19日传来消息，万晓塘书记自杀身亡，有花圈悼念。据说是服安眠药，死在澡盆中。（文革后的材料说万书记是因心脏病暴发猝死。）

1966年夏秋，白色恐怖达到极致。

在十二分抑郁中，同学来告诉我，河西区学生们正在报名去兵团，她可以替我办手续；我心动了，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上山下乡，学生们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年轻人火热的心，支援边疆，“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有的主要是因为政审不过关，前一年中考、高考落第，上山下乡算是一条出路。有的是被“动员”，日以继夜，三番五次，熬不过去……我又是一种情况，在地下室写检查，无日无月，无休无止，实在忍无可忍了！

去兵团，我政审一定不合格，也不敢过问办的细情，总觉得自己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怯怯的、惴惴的，似乎是落荒而逃。这种担心在上车之前、上车之后，以致最初到西北的日子里一直持续着。退天津市户口的时候，万般无奈的母亲，没有说什么。

即将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前一天晚上，我独自来到天津母亲河——海河边。看着倒映在水中的几点惨淡灯光，思绪随着脉脉的流水，跑得好远好远。

我怀念读了六年书的母校和高中三年所在班级。我的班级，自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的高三三班是女生重点班，全面发展，样样争先，各级奖状挂满一面墙壁，大家

的心太齐了。记得学校操场不大，每次上体育课，都排队到附近的新华路体育场去。几百米路程，不需要喊口令，后边的同学随着前面同学脚步，齐刷刷地走到体育场，曾经投来多少赞许的目光。如果高考制度不废除，又会如何呢……甚至高中毕业都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合影……

在改革开放中，母校再次振兴了！2000年，50周年校庆，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老校长来了”！“老校长来了”！随着礼堂爆满的欢呼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在学生们的搀扶下，款步走到师生们中间，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学生们高举鲜花跑上前去，校庆的热烈气氛鼎沸。望着熬过劫难，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我真是百感交集。又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班中不少同学文革后又上了大学，而且不乏成绩卓著者，这都是后话。

快乐的童年、幸福的少年，一切，一切，都好像那么遥远了。远得好像是幽暗的河水尽头，远得好像是苍穹神秘莫测的星星。面临自己的将是什么，茫然无知。生活会是很艰苦的吧，不论如何，肉体的恐怕比精神的容易熬过吧。

1966年仲秋的一天，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放逐了……

□ 原载“天津记忆”微信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